

史學篇

统战篇

管理篇

序

SI KAO DE YIN HEN

思考的印痕

薛建民 著



宁夏人民出版社
NINGXIA PEOPLE'S PUBLISHING HOUSE

薛建民 ● 著

思考的印痕

KAO
DE
YIN
HEN



宁夏人民出版社
NINGXIA PEOPLE'S PUBLISHING HOUSE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思考的印痕 / 薛建民著. — 银川:宁夏人民出版社,
2005.6

ISBN 7-227-02960-3

I. 思... II. 薛... III. 社会问题—研究—中国
IV. D669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5)第 049613 号

思考的印痕

薛建民 著

责任编辑 刘建英 戎爱军

封面设计 张 宁

出版发行 宁夏人民出版社

地 址 银川市北京东路 139 号出版大厦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宁夏捷诚彩色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 880×1230mm 1/32

印 张 9.75

字 数 240 千

版 次 2005 年 6 月第 1 版

印 次 2005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印 数 2000 册

书 号 ISBN 7-227-02960-3/D·185

定 价 22.00 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序

李西平

得知薛建民同志的论文集《思考的印痕》即将付梓，为他感到由衷的高兴。

建民同志 1966 年中学毕业时，正赶上十年“文革”，失去了继续深造的机会，被上山下乡的洪流席卷到农村接受再教育。期间，他种过地，赶过车，当过黄河纤夫。1970 年，他被招工到地处贺兰山深处的石炭井矿务局当了一名采煤工。他十分珍视这来之不易的工作机会，更对煤矿这块战天斗地的热土和吃苦耐劳、朴实善良的煤矿工人产生出深深的敬意和眷恋。他不由自主地拿起了笔，热情地歌颂矿山，赞美为人类奉献光和热的煤矿工人。经过 30 余年的勤奋努力，他由一名普通的采煤工人成长为宁夏煤业集团的中层领导干部。

一个勤于思考、善于思考的人，探索的脚步是永远也停不下的。建民同志从上个世纪 70 年代初开始从事宣传思想工作，始终没有放松对知识的追求和对社会的思考。他虽然没有进过正规的高等院校学习，但是对知识的渴望促使他一直坚持自学。他先是考入宁夏教育学院中文函授和宁夏自治区党校脱产学习政治理论，

《思考的印痕》收录了建民同志近 20 年来在区内外报刊杂志上发表和获得省级以上奖励的 25 篇理论文章,分为史鉴篇、伟人篇、吏治篇、统战篇、文化篇、管理篇六个栏目,内容较为丰富,涉及政治、经济、党史、党建、统一战线、企业文化、民族理论、干部管理及职工思想政治工作等方面,既有宏观的理论探索,又有对基层实践的理性思考,理论性、思想性、指导性和针对性都较强,显示出作者在观察、分析、思考问题时开阔的思路、深刻的思想以及较深的文字功底。

“纸上得来终觉浅，绝知此事要躬行。”建民同志的文章，都来源于多年基层工作的亲历和实践所悟，贯穿了与时俱进的创新思维，相信读者会从中汲取到丰厚的知识营养，领悟到闪光的思辨色彩。比如《从历史经验看宁夏经济腾飞之路》一文，作者回顾了宁夏改革开放前后20年的发展历程，实事求是地分析了宁夏经济发展过程中的得与失，对宁夏解放50余年的发展思路进行了重新审视，并站在一定的高度，提出了自己的发展观。今年是抗日战争胜利60周年和红军长征胜利70周年，建民同志特意将《红军长征的伟大历史意义及深远影响》、《长征精神鼓舞我们从胜利走向胜利》、《中国抗日战争胜利的哲学思考》等文收入书中以示纪念，具有特别的意义。

2005 年 5 月 8 日

目 录

一、史鉴篇

- 红军长征的伟大历史意义及深远影响 (1)
- 长征精神鼓舞我们从胜利走向胜利 (12)
- 中国抗日战争胜利的哲学思考 (19)
- 关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党的基本路线的哲学思考 (41)
- 民主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赢得人民群众拥护的主要原因 (63)
- 从历史经验看宁夏经济腾飞之路 (82)
- “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理论思考 (95)

二、伟人篇

- 毛泽东的独立自主意识 (103)
- 毛泽东的创新精神 (117)
- 邓小平的人民情结 (130)
- 邓小平的谋略智慧 (147)

三、吏治篇

- 唯物辩证法的系统思想在领导班子
 配备上的运用 (159)
- 干部交流之我见 (173)

参加社会实践活动是党校教师	
健康成长的必由之路	(179)
为纪检工作创造良好的环境	
推动党风和廉政建设健康发展	(185)
贪污贿赂犯罪的危害及对策	(194)

四、统战篇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	
是符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政党制度	(200)
关于国有大中型企业党外知识分子工作的思考	(213)
坚持和完善民族区域自治制度	(219)

五、文化篇

坚持和发展毛泽东文艺思想,团结教育鼓舞	
人民更好地进行现代化建设	(238)
煤矿文化刍议	(252)
加强企业宣传文化建设,推动矿区精神文明发展	(262)

六、管理篇

思想政治工作也要坚持改革开放	(277)
企业改制要有科学的内部管理	(284)
关于做好国有煤炭企业关井破产工作的思考	(293)

后 记	(303)
-----------	-------

红军长征的伟大历史 意义及深远影响

(一九九六年十月)

1996年是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 60 周年。

艰难的长征使中国共产党人逐渐走向成熟。长征中,中国共产党人重新审视了自己的行动,摒弃了错误路线。在以毛泽东为代表的正确路线指引下,红军主力摆脱了国民党的围追堵截,实现了北上抗日的战略转移,挽救了党,挽救了红军,挽救了中国革命,使中国革命转危为安。

长征精神不仅推动了抗日战争和人民解放战争的胜利,而且对社会主义建设和今天的现代化建设有着深远的政治意义。

一、艰难的长征促使中国共产党走向成熟,长征的胜利使中国革命转危为安

1927 年大革命失败后,中国共产党经历了创立以来从未有过的艰难岁月,不断遭到反动派的“围剿”,因而长期处在反“围剿”的战争状态。

创建初期的党中央在国内外矛盾错综复杂、政治风云瞬息万变的非常时期,对政治形势、阶级关系和斗争策略往往缺乏冷静的分析与正确的把握。在大革命后期犯了陈独秀右倾投降主义错误,土地革命时期又犯了瞿秋白“左”倾盲动主义、李立三“左”倾冒险

思考的印痕

主义和王明“左”倾教条主义的错误。特别是20年代末到30年代初在党内盛行的把马列主义教条化,把共产国际决议和苏联经验神圣化的错误倾向,推行了一套严重脱离中国实际的路线、方针、政策,不但使一度好转的形势受到摧残,而且使中国革命几乎陷于绝境。

在艰难的长征中,中国共产党人陷入深层次的思索,实践使他们逐渐走向成熟,不仅从军事路线上找到了失败的原因,而且从思想路线和政治路线方面找到了失败的根源。

(一)“左”倾路线的统治,使革命遭受惨重失败

中央红军长征,是因第五次反“围剿”的失利而被迫进行的。

1931年1月党中央六届四中全会召开后,以王明为代表的“左”倾冒险主义路线开始了对党的统治。1931年11月的中央根据地党代表大会和1932年10月的宁都会议根据六届四中全会的错误纲领,污蔑毛泽东的正确路线为“富农路线”和“极严重的一贯右倾机会主义错误”,并撤销了毛泽东在党内和军内的领导职务。

但是,因为毛泽东的正确战略方针在红军中有深刻影响,使远在上海的中共临时中央的错误路线尚未完全贯彻到中央和其他革命根据地以前,1933年春的第四次反“围剿”仍然取得胜利。

临时中央负责人博古不懂军事,通过共产国际请来了一位德国人李德为军事顾问。1933年9月下旬,李德到中央革命根据地时,正是蒋介石对中央革命根据地发动第五次“围剿”的时候。在博古的支持下,李德掌握了中央军事指挥大权,进一步排斥了毛泽东等人的正确主张。李德以独断专行的作风,代替了中央军委的集体领导。在第五次反“围剿”中,李德极力推行他的“御敌于国门之外”等一套军事教条主义的错误方针,根本不考虑红军在数量上和武器装备上的劣势,实行进攻中的冒险主义和防御中的保守主义,指挥红军打阵地、拼消耗。在他们的错误领导下,红军虽英勇奋战一

年,但最终未能粉碎敌人的第五次“围剿”。至此1934年10月不得不放弃中央革命根据地,实行战略大转移——长征。

长征初期,“左”倾教条主义者从进攻中的冒险主义变成退却中的逃跑主义,他们既没有在广大干部群众中做深入的思想动员,又没有做好必需的准备工作的准备工作就仓促转移。10月16日从根据地出发到11月30日突破湘江,在短短45天中,红军虽浴血奋战,冲破敌人四道封锁线,但损失惨重,由8万余人锐减到3万余人。失败和挫折使部队中怀疑与不满的情绪达到顶点。广大干部战士逐渐觉悟到这是排斥了毛泽东的正确领导,违背了在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和土地革命战争中以毛泽东为主要代表的红军指战员从实践中逐步制定出来的符合中国革命战争实际的一整套战略战术,实行了错误主张的结果。

过了湘江之后,“左”倾教条主义者不顾蒋介石已经调集40万大军,在湘西布下口袋阵,要全歼红军的严重情况,仍要坚持原定与红二、六军团会合的计划。在这关系红军生死存亡的紧急关头,毛泽东提出了放弃与红二、六军团会合,改向敌人力量薄弱的贵州进军的主张。经过激烈争论,毛泽东的主张被大多数同志采纳,红军改向贵州前进。刘伯承在《回顾长征》一书中这样写道:“当时如果不是毛泽东坚决主张改变方针,所剩三万多红军的前途只有毁灭。”

(二)在历史的磨合中,党和红军作出了正确的选择

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和长征初期红军遭受的严重挫折,打破了王明等人百分之百正确的神话。高昂的代价和沉痛的教训,使党的领导人不能不对军事战略上的争论和战术上的得失进行深入的思考。正像张闻天在一次中央军委会议上和博古发生争论时所说的:“我们中国的事情不能完全听李德的,我们自己得有点主意。”越来越多的人,包括曾经跟着“左”倾错误跑的同志,都陆续觉悟到王明军事路线是错误的,认识到只有毛泽东的正确领导,才是

红军百战百胜的保证。因而,盼望毛泽东回来领导革命、指挥红军,已经成为广大指战员的共同心声。同时,由于长征以来,毛泽东对执行王明“左”倾冒险主义的一些领导同志做了大量细致的工作,使他们在实际教训面前醒悟过来,转而反对“左”倾错误。终于在遵义会议前夜,就排除了李德,不让李德指挥作战。在这种情况下,1935年1月红军占领遵义后,召开了政治局扩大会议。

遵义会议首先解决了当时最紧迫的军事路线问题。这次会议重新肯定了毛泽东关于红军作战的基本原则,批判了王明“左”倾冒险主义在军事指挥上所犯的严重错误和组织上取消集体领导的严重错误。会议增选毛泽东同志为政治局常委,实际上确立了毛泽东在全党和红军中的领导地位。这次会议是党第一次独立自主地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原理与中国革命具体实际相结合解决自己的路线、方针、政策,它在紧急关头挽救了党,挽救了红军,挽救了中国革命。

(三) 中国共产党在长征中走向成熟

长征促进了中国共产党走向成熟。遵义会议是中国革命史上生死攸关的伟大转折点,也是中国共产党从幼稚走向成熟的重要标志。

在遵义会议之前,我们党虽然也领导革命取得过重大的胜利,但总的看来,还不太成熟。在共产国际的指挥下,脱离了中国的国情,犯了“左”的和右的错误,特别是那种把马克思主义教条化,把国际经验神圣化的倾向对我党的影响很深。遵义会议首先解决了这个问题,不仅大胆地解除了洋教条李德的兵权,同时还批评了他在军事指挥上的错误。这在当时是一种十分难能可贵的行动,也是我党历史上第一次敢于顶住外来压力的行动。

遵义会议开创了中国共产党人独立自主地解决自己问题的先例,独立自主地制定了党的正确路线与行动方针,独立自主地选择了自己的英明领袖,独立自主地解决了组织领导中国革命战争的

问题。它的成功深刻地揭示了一条最重要的革命真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伟大力量，就在于它是和各个国家具体的革命实践相联系的。”实践证明了中国共产党人完全有独立自主解决内部复杂矛盾的能力，表明中国共产党在政治上已经成熟，有能力领导中国革命战争取得胜利。胡锦涛同志《在纪念遵义会议 60 周年座谈会上的讲话》中谈道：“遵义会议最重要的历史贡献，就是开始在全党范围内确定了把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革命具体实际结合起来，独立自主地解决中国革命重大问题的基本原则和方针；开始形成了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保证了党的马克思主义路线的贯彻执行；开始从根本上改变党内生活不正常的状况，为按照民主集中制原则确立正确的领导制度和维护党的团结统一提供了宝贵的经验。”

长征使红军在军事上开始走向成熟。“遵义会议以后，中央红军一反以前的行军方式，好像忽然获得新的生命。在毛泽东等指挥下，根据实际情况的变化，灵活地变换作战方向，忽东忽西，迂回曲折地穿插于敌方重兵之间，红军处处主动。在遵义以西，四川、贵州边界反复四次渡过赤水河，使敌军感到扑朔迷离，疲于奔命。……摆脱了几十万国民党军队的围追堵截，取得了战略转移中具有决定意义的胜利。”^①长征中红军坚持人民战争，在游击战中不放弃一定条件下的运动战。坚持了红军不单纯打仗，还要宣传群众、组织群众、武装群众，帮助群众建立革命政权，以至建立共产党的组织等项重大任务的做法，唤起了民众，扩大了抗日后备军。

长征使党在思想上走向成熟。遵义会议以后，党从中国革命战争的实际出发，纠正了教条主义错误，在认识上产生了理性的飞跃，在理论上逐渐形成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普遍原理与中国革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毛泽东思想。

① 胡绳：《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中共党史出版社，1991年版，第127页

思考的印痕

长征使党在政治上走向成熟。长征中以毛泽东为代表的新的中央领导,重新审视中国革命的新形势,以大无畏的革命气魄,紧紧抓住抗日这个机遇,果断地指挥红军北上抗日,挺身迎接这个挑战。他们清醒地看到,在外敌入侵的紧要关头,要把第五次反“围剿”失败处于革命低潮的群众运动重新转入到即将来临的全面高涨的抗日救亡运动中,则必须发动、组织和领导群众,构成抗战的最基本力量。美国学者哈里逊在其所著《夺取政权的长征(中共党史)》一书中认为:“中共取得成功的真正关键,既不仅仅在于民族革命,也不在于社会革命,而在于共产党人是有民族主义(民族革命——笔者注)和社会革命的旗帜下将中国人民组织起来的本领。”埃德加·斯诺说得更彻底:“中国共产党在他们自己的胜利中却有一个祖国。”长征路上,党中央机智、果断、策略地粉碎了张国焘分裂党、分裂红军的阴谋,进一步明确党指挥枪的原则,指挥红军爬雪山,过草地,顺利到达陕北。

抗日是民众的事情,只有动员民众,才能进行战争;只有依靠民众,才能取得胜利。在抗日高潮到来之际,中共中央在陕北于1935年12月召开了著名的瓦窑堡会议。会议的决议和毛泽东的报告,从理论和政策上正式确立了中国共产党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策略方针,提出了“党的任务就是把红军的活动和全国的工人、农民、学生、小资产阶级、民族资产阶级的一切活动汇合起来,成为一个统一的民族革命战线”^①。毛泽东批评了“左”倾关门主义错误,同时强调了共产党在统一战线上的领导权。

所有这一切都说明中国共产党在长征中走向成熟。

这种成熟是中国共产党人面对挫折和失败,敢于正视共产党自己内部的错误,“党勇敢地揭发了这种错误,从错误中教育了自己,学习如何更好地领导革命战争到彻底胜利”。遵义会议,是建立

^①《毛泽东选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51页

在中国共产党人自我认识、自我总结的基础上的。红军在以毛泽东为代表的正确路线指引下,摆脱了国民党的“围剿”,战胜了艰难险阻,胜利到达陕北,建立了陕北抗日革命根据地。长征的胜利,使中国革命转危为安,为中国民主革命的胜利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二、长征的胜利,向全世界展示了红军的风采,加深了各族人民对中国共产党的信赖

“长征是历史纪录的第一次……自从盘古开天地,三皇五帝到于今,历史上曾经有过我们这样的长征吗?十二个月光阴中,天上每日有几十架飞机轰炸,地下有几十万大军围追堵截,路上遇着了说不尽的艰难险阻,我们却开动了每人的两只脚,长驱二万余里,纵横十一个省。请问历史上有过我们这样的长征吗?没有,从来没有的。”“长征是宣言书,长征是宣传队,长征是播种机……长征是以我们胜利、敌人失败的结果而告结束……长征一完结,新局面就开始。”当年指挥着英雄的红军从困境中走出来的毛泽东对长征的这段评价,真实地记叙了红军长征的壮观场面。

(一)红军是英雄好汉

“红军不怕远征难,万水千山只等闲……”“红军都是钢铁汉,千锤百炼不怕难;雪山低头迎远客,草毯泥毡扎营盘”。毛泽东的《长征》和肖华的《长征组歌》,把我们带到了当年的征途上,使我们领略了中华民族的英雄气概和壮丽的民族画卷。雪山之巅,大渡河畔,回旋着英雄的忠魂。从江西瑞金到甘肃会宁这二万五千里的征途上到处传颂着红军长征传奇般的故事。

长征中“触目惊心”的统计数字足以说明红军是英雄好汉。在这漫长的征途上,几乎平均每天就有一次遭遇战。在368天的征途中,有235天用在白天行军上,18天用在夜间行军上,有整整15天用在打大决战上,路上只休息了44天,平均每走365里休

整一次,平均每天行 71 里。斯诺曾感慨道:“一支大军和它的辎重要在地球上最险峻的地带保持这样的平均速度,可说几乎是奇迹。”红军一共爬过 18 条山脉,其中 5 条是终年积雪的,渡过 24 条河流,经过 11 个省份,占领过 62 座大小城市,突破 10 个地方军阀军队的包围。此外还打败追击他们的中央军各部队。他们开进和顺利地穿越 6 个不同的少数民族地区,有些是中国军队几十年所没有去过的地方。

斯诺无比感慨地写道:“不论你对红军有什么看法,对他们的政治立场有什么看法(在这方面有很多辩论的余地——笔者),但是不能不承认他们的长征是军事史上伟大的业绩之一。在亚洲,只有蒙古人曾经超过它,而在过去三个世纪中从来没有发生过类似的举国武装大迁移……”这就从另一面说明了红军是一支英雄的部队。

(二)红军是人民的军队

长征初期,红军被迫离开根据地后,遇到了前所未有的困难。除了雪山草地、天险急流的阻隔和对付国民党的围追堵截外,更主要的是失掉了原有的群众基础,犹鱼断水。没有吃的、住的,加之国民党反动派对红军的反面宣传,给红军造成了很大的困难。尤其是在少数民族聚集的川康地区,遇到了更大的麻烦。当红军走进浓密的森林和跨过十几条大河时,部族的人就从他们进军的途上后退,坚壁清野,把所有吃的、牲口、家禽都带到高原去,整个地区没有了人烟……

在这种艰难困苦的情况下,红军以其严明的群众纪律,高昂的革命斗志和富有成效的群众工作,戳穿了国民党反动派的谎言,建立了新的军民关系。长征中,红军将运输不及的大量物资就地分配给穷人。红军焚毁地契,取消捐税,还发给了贫农武器;甚至没收了火腿商的火腿也分给了农民。

斯诺来红色根据地采访后写道：“在某种意义上来说，这次大规模的转移是历史上最盛大的武装巡回宣传。红军经过的省份有二亿多人民。在战斗的间隙，他们每占一个城镇，就召开群众大会，举行戏剧演出，重‘征’富人，解放许多‘奴隶’（其中有些参加了红军），宣传‘自由、平等、民主’，没收卖国贼（官僚、地主、税吏）的财产，把他们的财物分配给穷人。”因而，后来“到处受到农民群众的欢迎。他们大军未至，名声早已传到，常常有被压迫农民派代表团来要求红军绕到他们乡里去解放他们”，“有千百万的农民看到了红军，听到了他们讲话，不再感到害怕了。他们武装了千千万万的农民，留下干部来训练游击队，使南京军队从此疲于奔命”。红军尊重少数民族的风俗习惯，以党的民族政策为指导，与少数民族交朋友。在进入彝族境内时，红军参谋长刘伯承亲自和彝族首领谈判，并按照部落传统方式，歃血为盟，结为兄弟。在通过宁夏回族区域时，红军严格执行总部制定的“三大禁令”和“四大注意”，切实做到了秋毫无犯。红军用自己的实际行动讲清了“白汉”与“红汉”的区别，消解过去推行大汉族主义所造成的民族隔阂。

长征中，红军所到之处的所作所为向人民群众证实了这样一个事实：他们是各族人民的军队，因而会赢得人民的支持。在漫长的艰苦的征途上，有成千上万的人倒下了，可是另外又有成千上万的人——农民、学徒、奴隶、国民党逃兵、工人，一切赤贫如洗的人们都参加进来充实了红军的队伍。

（三）红军是抗日的部队

红军长征，向天下昭示了一个的事实：共产党领导的红军是抗日的部队，民族的脊梁。这与国民党反动派的军队形成了鲜明的对照。

早在长征前，中国共产党及其红军就对抗日表明了态度。1931年“九一八”事变和1935年“华北事变”后，日军侵占我东三省、华北，企图侵占全中国。中日民族矛盾已经上升为中国社会的主要矛

盾。在中华民族生死存亡面前,以蒋介石为首的南京国民政府为维护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利益,顽固坚持“攘外必先安内”的内战政策。在这种情况下,中国共产党从民族的根本利益出发,首先提出武装抗日的爱国主张和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思想。“九一八”事变后的第三天,中国共产党发表了反对日本帝国主义侵略的宣言。1933年1月,中国共产党再次发表宣言,愿意在“立即停止进攻苏区红军”、“给予民众民主权利”和“武装工农”这三个条件下,准备同任何国民党部队订立共同抗日的协定。1934年7月5日,中共中央和中国工农红军革命军事委员会发布政训令,派遣由红七军团组成的北上抗日先遣队深入敌后,在闽浙皖赣边地区开展游击战争。

长征开始后,中国共产党和红军在抗日方面又有大的举措,由“中革军委”电令闽浙赣省委和新红十军主要负责人方志敏将红十军和新红七军以及新升级的地方武装合编,成立红十军团,组成更为强大的北上先遣队。1934年11月4日,中央命方志敏率领红十军团北上,向皖南挺进。红军北上先遣队历时六个多月,行程五千余里,在极其艰难困苦的条件下,进行了英勇顽强的斗争,以实际行动宣传了中国共产党的抗日救国主张,配合了中央红军的战略转移。

1935年8月,中国共产党又发表了著名的“八一宣言”,明确表示了共产党和红军愿意与中国一切愿意参加抗日救国事业的各党派、各团体,包括国民党在内的一切地方军政机关进行谈判,共同筹组统一国防政府和抗日联军,号召各党派和军队捐弃前嫌,应持“兄弟阋于墙外御其侮”的真诚觉悟,首先停止内战,以便集中一切国力去为抗日救国的神圣事业而奋斗。中央红军到达陕北后,中国共产党为了抗日,决定组成以彭德怀任总司令、毛泽东任总政委、叶剑英任总参谋长、杨尚昆任总政治部主任的中国人民红军抗日先锋军。1936年1月15日下达东进命令,2月17日发表《东征